

赵文林 著

中国 在 21 世纪的演变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中 国 在 21 世纪的演变

赵 文 林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1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赵文林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9

ISBN 7-80092-249-9

I. 中… II. 赵… III. 社会科学-问题-研究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7446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 7.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 7.80元

关于预测的哲学和科学（代序）

预测的理论和方法是未来学研究的内容。在遥远的古代，不论中国还是外国，人们就已经开始设法对未来进行预测。占卜就是中国人预测吉凶的一种手段。殷墟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甲骨文记录了占卜的卜辞。《易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卜卦的书。古希腊有所谓智者，他们也以预言吉凶而闻名于世。预测未来是人们实践的需要，所以一直盛行不衰。中外史籍中都保存有不少准确预测的记录，但作为一门科学，应该说，未来学还很年轻。

未来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可知论和客观规律论。世界可知论断定，我们认识到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人们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修正错误，由现象逐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当然，可知论不排斥“未知”和“不知”。既然认识永无止境，不断有某些未知领域转为已知，那就得承认永远存在“未知”的世界，也就是说，永远存在尚未认识的事物。由于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所以，承认可知论并不等于事事必知，更不是一研究就知。与可知论对立的不是“不知”，而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宣称，人们认识到的事物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不可知论是一种与科学和实践完全不相容的理论，它妨碍人们正视现实、勇于探索和创造未来的精神，严重影响着科学的发展。

客观规律论认定，我们的宇宙中存在着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事物的变化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人们要进行预测，就必须研究和认识事物的这种规律性。在历史学领域中，客观规律论又称为历史决定论。（但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与宿命论混淆，所以本书中不用这一词汇，而沿用“历史规律论”的提法。）历史规律论不排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行为的随机性，而是说人的行为从整体讲是有规律可循的。与历史规律论对立的不是“主观能动性”和“随机性”，而是“反决定论”或“偶然堆积论”，或“偶然事件交织论”。这些理论宣称，人的行为为其主体的认识和意志所决定，而认识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要推测人的行为和由人的行为组成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它们还根据这些拙劣的“逻辑”推理，宣告历史决定论的“破产”。其主要特点就是故意回避了下列一些事实：（1）个人的行为不完全能由其认识和意志决定；（2）行为主体的精神世界虽有变化，历史上虽有偶发性的事件，但在发展变化的主体精神和偶发性事件的背后也存在客观规律；（3）当人们对变化不已的认识状态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认识的发展也有规律；（4）即使研究者一时未能对变化的思想认识规律加以确认，也不能由此推论说不存在决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破产的是“反决定论”者自己。

以世界可知论和客观规律论为指导的未来学研究者，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实地预测时，一般综合使用以下四种具体研究方法：

（一）合力论 这是恩格斯于1890年9月在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他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

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 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这就是恩格斯著名的“社会合成力学”观点。这个观点说明：（1）行为主体个人的许多特殊生活条件形成各自的行为意志；（2）每个主体的愿望都要遭到其他人的妨碍而不能完全如愿以偿，所以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情；（3）所有行为主体为实现自己愿望而作的努力形成无数交错的力，这些力按照平行四边形定理形成一个总的合力，产生历史事件；（4）因此，历史可以看作是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 的产物，看作是服从于某种运动规律的自然进程；（5）每个个人意志对合力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这种社会合成力学的观点进行预测，就要客观地分析各种社会力量是怎样形成的，对比各种力量的强弱，说明它们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合作或斗争，最终将发生什么变化，绝不可以美好的愿望为指归。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二) 概率论 这是现代数学给未来学提供一种宝贵的研究方法。概率论认为,世界上存在大量的随机现象。从表面看,随机现象具有偶然的性质;但在大量试验或观察下,从其整体来看却呈现出某种规律性,而且在一组随机现象中,各种事件出现的频率还可以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来。这种频率的稳定值称为概率。例如,中国下一年有哪些育龄妇女将要生孩子,这是无法一一确定的,但下一年中国人的出生率却是可以较准确地推算出来的。

预测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次性的事件;一种是某一类事件的集合。一次性事件就是确切指定的一个事件,即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某一事态。某一类一次性事件的集合更多的是社会性现象。例如A厂某年实行股份制是一次性事件,B厂某年实行股份制又是另一个一次性事件。……一批企业某年实行股份制则是社会性现象。历史预测主要是预测各种社会性现象的产生、发展、衰落和消灭。它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笔者拟在有限的篇幅内,着重预测中国未来各种重要的集合性社会现象。

在预测社会现象中使用概率论观点,既能避免机械决定论又能与历史唯心主义划清界限。概率论在计算事件集合发生的概率时可以去断定其中某一基本事件必然发生或必然不发生,但却能断定事件集合出现的频率。单一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而事件集合按一定频率发生则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必然性体现为一定的概率。不过,笔者在本书中主要是使用概率论的观点来与历史唯心论划清界限,而不具体地进行概率计算。

(三) 群众经验论 既然所有人的行为出发点都依据他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尽管这些认识和意志在行为的相互交错过程中不可能得到完全地体现,但不能说这些认识和意志毫无作用,相反,体现多数人共识的那些见解往往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实证明,历史经常不按个别智者规划的最佳方案前进,而往往是按照多数群众的经验判断发展。这里所谓的群众经

验，一般是广大群众根据前一段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偏颇而作出的总结，因此，群众的普遍意志往往表现为对前一时时期社会弊端的反弹。例如，西汉王朝前期政治家就废除秦王朝前政，强调与民休养生息，实行了许多正确的政策，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社会生产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客观地讲，群众的经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最佳的历史选择。正因为如此，历史经常会出现反复、倒退，曲折前进。在群众愤怒地反对前一时时期弊端的浪潮中，可能会抛弃一些他们不该抛弃的东西，甚至很珍贵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是说，少数智者或有权势人物的思想和意志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但他们之所以能“掀起”巨浪，是因为广大群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思想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变成物质力量。

我们这里讲的群众经验指的是广义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把“实践”广泛地理解为所有人的各种行为，包括前人的各种行为，而限于本人行为的经验总结。这种经验总结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正确的革命理论要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必须像列宁强调的那样，要使广大群众跟共产党前进，“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①。

因此，对未来中国社会进行预测必须充分估计各个时期群众的亲身经验对历史的巨大影响，必须充分估计符合群众亲身经验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巨大影响。反过来，对近50年中国广大群众亲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身经受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也往往能大体上摸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脉搏，并预测在这些思想、感情、意志影响下后50年人们的行为追求。这就是“知今必鉴古”、“温故而知新”。

（四）其它科学理论与方法 这方面的理论与方法很多，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吻合的“老三论”和“新三论”，灰色预测以及综合集成方法，数学的插值法和函数逼近，等等。不过这些具体方法一般是在较低的层次上使用。

未来学不限于预测，更重要的是要在预测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基于以下三种环节：（1）人们会认为这种战略是应该施行的，因为它将带来某种良好的结局；（2）为此，他们努力按照这种战略进行实践；（3）实践之后，必然会带来某种良好的结局。这三个环节若有一个缺失，则整个预测就会落空。所以，提供未来发展战略是未来学中最困难的部分。

目 录

关于预测的哲学和科学（代序）	1
楔子：华人的梦	1
一 中国人口膨胀的最高限界	6
二 向新台阶的艰苦攀登	11
三 基础产业现代化	18
四 全民所有制的演进	24
五 多种经济成分的合作与矛盾	38
六 计划调控的曲折进展	47
七 社会主义市场的发育与控制	57
八 财政金融改革的再改革	78
九 企业规模、结构与组织	92
十 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和责任	100
十一 分配的理论 and 实践的深化	108
十二 科技战略和科研新机制	118
十三 未来中国教育面面观	128
十四 德法兼治 德治为主	146
十五 三律治国	152
十六 纯自卫的国防建设	174
十七 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	178
十八 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兴盛	193
十九 中国人向21世纪历史呈上的三份答卷	202

楔子：华 人 的 梦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中居第四位或第三位。印有“中国制造”商标的技术设备遍布各大洲贸易市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有中国人办的企业。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通用货币和重要结算手段之一。挂着中国国旗的远洋船队总吨位居世界第二或第一。中国每年接待数以千万计的外国游客，同时每年有上百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工作、经商或旅游。中国人口将在14亿的水平上实现零增长。中国除因懒惰或违反劳动纪律而受到暂时的惩罚性失业者外，能普遍就业。人们的收入与他的劳动态度和效果成正比。因自然级差而产生的低收入者生活得到社会保障，人们过着普遍较为富裕的生活。中国成为一个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的和平国家，但其防御系统足以把从外层空间飞来的武器击毁在途中，足以把入侵的军事力量消灭在国门。全世界几乎所有人文大学都有汉语教学。汉语与英语、法语一样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来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达10万人。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庄重地聆听中国代表的和平公正的主张。中国不插手干预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永远不当世界警察，但每年拨出巨款救济国外的难民和穷人。中华民族融合成为一个高文化、有教养的民族。全世界遵守当地国家公平法律的华人都得到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尊重。国内外华人相亲相爱，诚实而勤恳。中华大地成为环境保护的净土。人们还想有一天在奥运会上看到中国男子代表队参加篮球和

足球的决赛。……

建立一个繁荣富强、不受人欺侮和歧视的中国，这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梦，是黄炎培、陈嘉庚和无数海内外华人的梦，是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和几千万先烈的梦，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梦，是现代在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的国民党人共同的梦。这是中华民族的梦。

许许多多外来侵略者失败了，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

21世纪是中国人变梦想为现实的世纪。

中国人就是带着这种奋进的精神状态来书写21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只有充分认识历史主体的精神状态并充分估计它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再冷静分析客观条件，才能作好下世纪中国发展预测，这是不言而喻的。

有着共同理想的中国人会认真地思考怎样为实现理想创造条件，怎样避免做出背道而驰的事情，怎样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合理的科学的对策。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另一种相反的估计。一种危险的前景无疑是存在的，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如果从现在起我们基本停止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那么，随着50年代初期以前参加工作、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的大批干部到龄退休（或离休），年轻干部大批接班，假若这些年轻干部中，相当多的人对资本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对完善社会主义却丧失信心；他们在各级领导层中所占的比例，随着事实上少考虑政治信念、多凭学历与才干选拔干部做法的普遍采用而愈来愈大；加上帝国主义者公开支持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寻衅滋事；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人们将会看到东欧、苏联在90年代初的变化在中国重演。美国前总统将举杯庆祝他终于成为“在本世纪埋葬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见证人”。

——如果我们仍然缺乏反腐败的有效措施，随着今后的进一步放开，大量官倒将以更恶劣、更合法的形式出现。不少官员本人（或以子弟亲属的名义出面）利用特权采取各种手段，挖国有经济墙脚，牟取暴利成为巨富。在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背景下将逐渐出现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的阴影。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将下降到极点，以致在它90岁生日到来前风平浪静地遭到取缔，而不会发生类似前苏联1991年的“8·19”事件。而且在推翻共产党过程中立了功的官僚资产者在共产党被推翻后又会成为“新贵”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共产党被解散，获得美国支持的达赖喇嘛集团煽动西藏分裂的愿望有可能实现。一旦西藏分裂，突厥语系诸族、蒙古民族内部将出现连锁反应。在此情势下，台独分子将推翻台湾国民党政府实行分裂。香港和澳门在此情势下将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于是，一个中国将分裂成七八个国家。现代中国被叫做“前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写《中国史：B.C8000—A.C2000》。

——由于中国共产党被解散，以资本家利益为第一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以劳动者利益为第一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将出现2亿至2.5亿失业者，即使经济恢复以后，失业大军也会长期保持在1亿以上。

——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价格制度以激烈的方式取代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由于政治剧变期的税收工作与其它工作一样受到严重影响，国家将大量发行货币，出现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现有的存款10万元以上者除极个别者外，那时均将化为乌有。

——由于国家分裂、大量失业、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以每年10—20%的速度下降，7至10年后会到达低谷。眉开眼笑的西方政治家将会发现，人口这么多的落后的资本主义中国比俄罗斯更不值得认真援助，而且他们由于国内经济拮据，确实也无法兑现其在鼓动演变期出于策略考虑而许下的种种“援助”诺言。

——由于生产下降、失业和通货膨胀，至少有9亿中国人陷入赤贫境地。中国城乡将有数千万乞丐。治安急剧恶化。中国人口将再一次出现灾难性的下降，非正常死亡者将达5000万以上。

——由于阶级斗争在中国特有的残暴性，一场令人发指的反共清算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不仅历次政治运动，40年代的国内战争、50年代的剿匪、土改、民主改革、镇反和肃反以及1989年的事件都将成为清算的内容。即使那些因在倒共过程中立功而洋洋自得的人也在劫难逃。原苏联和东欧地区进行的政治审判相形之下，不过小巫见大巫。

——当国内动乱在21世纪初基本停息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我国与邻国的边界尚未最后确定的部分以及南沙群岛已被别人瓜分，我国的南部领海版图被人压缩到海南岛附近。

——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进口，西方文化（包含好的、坏的）成为时髦的玩意儿。人们将把自己的子女取名为“约翰”或“玛丽”，“保罗”或“朱丽叶”，人们将忘记张衡、毕昇、谭嗣同、黄兴、鲁迅和夏明翰，就连台湾国民党人（如果他们还在的话）都要摇头叹气。一个长期抗拒了超级大国苏联指挥棒的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跟随另一超级大国应对进退。中国市场充斥着外国商品，而中国商品却在外国市场上绝迹。

——在国家分裂动乱的过程中，恰像数千年来多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曾一再出现过的情况一样，自然环境将进一步恶化。21世纪前期，沙漠前锋将延伸到黄河以南。长江将变成黄河，而黄河的泛滥年年不断。

.....

这也许是忧天的杞人做的噩梦。现在看来似乎根本不可能，恰像1984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的苏联那样，包括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里根和布什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苏联在10年之内解体是不可能的。

当然，即使是噩梦，也不会是无止境的。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现在还在盼望资本主义救中国的不少人，在绝望中将会起来战斗，愤怒的中华民族将会起来奋争。时代呼唤孙中山、毛泽东式的英雄人物。孙中山经过10次起义和40年奋斗，毛泽东经过28年战斗，恢复了中华民族的骄傲。未来的孙中山、毛泽东和他们的战友们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最后也必将会恢复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是，当他们胜利地宣布：中国经济已恢复到1998年的最高水平时，墙上的挂历已是2030年了。为期30年左右的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使中国丧失了最为珍贵的和平发展机会。那时，我们周边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已走在我们的前面。

问题十分明显，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即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可能性。

从最坏处设想，向最好处努力，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如何努力？笔者将对中国各个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作一预测，并对导向良性演进的方略作一选择介绍。

据说，中国古代预言者都惧怕“泄露天机”而遭杀身之祸，但现代预测科学要求淋漓尽致地揭示各种可能性，以期引起世人的高度警觉。这样才能避免国家与民族的灾难。白发老叟，无遑自顾。其实，这当中的许多意见也是一些同龄党员的共同想法。我们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我相信：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它能够全部或大部听得进我们的意见。

一 中国人口膨胀的最高限界

中国这一片地域的人口总数从公元前2000年的1000多万增到17世纪60年代的9100多万，3700多年才增加8倍。从那以后到1949年288年中，我国人口就增加了将近5倍^①，而从1949年到1992年43年间，中国大陆人口增加了1.16倍。1992年国民收入由1950年的347亿增至19845亿。如果此时人口数仍为1950年的5.52亿，则人均国民收入可达到3595元。可是，由于1992年人口增到11.72亿，所以，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700元。这就是说，有52.7%的国民收入为新增人口分享了。西方经济学家把发展中国家这种低水平的人均收入增长为人口增长所抵销的现象称为“人口陷阱”。中国至今仍在“陷阱”之中。

人口控制的历史曲折

一提起中国人口的增长，人们总是把过去领导人的失误看作主要原因，而不去寻求更深刻的社会原因。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人口一直按21—23.4%的增殖率增长，邵力子先生最早提出了控制人口的问题。1956年我国即已开始计划生育的宣传，并开始提供避孕用具。马寅初教授受到鼓舞，发表了他著名的《新人口论》。不料这篇无可指摘的著作竟遭到批判。以后主要领导人一再发表“人多是好事，但也有困难”的观点，加上实际控制不力，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直到1957年以前仍保持在21%以上。从50年代后期

^① 详见拙作《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541页。

起，全国各地农村社队分配口粮普遍照顾了人口因素。例如，四川采取的是70%按家庭人口分配，30%按工分分配。这就是说努力生产不如努力生育。况且初生小孩又吃不完全份粮食。在农民看来，分配时小孩多的家庭更合算，于是农村人口增长便失去控制。从1962年到1970年，人口按年平均27%的高速度增长。进入70年代后，一些老同志重返工作岗位，再次强调计划生育，后来限定每个已婚妇女只生两个小孩。当时城市各单位和农村生产队都规定了种种较严厉的限制办法，年增长率乃逐渐降到12%左右。到1980年，进一步动员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但由于农村生产队统一分配体制的改变，控制难度增大，年增长率反由1979年的11.61%上升到1982年的15.8%。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急于完成限制生育的任务，采取了一些更严厉的土政策。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强迫堕胎的现象。严控似乎有“效果”，像四川这样的大省，人口年增长率也曾降到10.94%。按照这种增长速度，到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是完全可能的。但政府不能不考虑这种强力控制的政策继续坚持下去会脱离农民群众。1985年，政府纠正了强迫性的做法，着重采取宣传说服和超生罚款的办法，并允许若干特殊情况可以多生一个。但这样一来，部分开始富起来的农民对罚款满不在乎。预交两份罚金要求多生两个的大有人在。“超生游击队”也出现了。于是人口增长率又扶摇直上。到1987年回升到16.68%。这时人们才发现，中国人口增长不能完全责怪过去的国家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小农经济的劳力再生产机制和传宗接代的传统不是单凭行政领导教育和罚款所能扭转的。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迅速进展，出现了“工业性下降”^①。1988年以后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92年降到11.64%，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① 详见拙作《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8—572页。